

中国古代书法名家集

王羲之书法集

王林
主编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羲之书法全集 / 王林主编.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102-04365-4

I. 王… II. 王… III. 汉字—法书—中国—东晋时代
IV. J2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4334 号

王羲之书法全集

王 林 主编

编辑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雒三桂

装帧设计: 郑子杰

责任印制: 丁宝秀

印 刷: 北京彩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68.5

印 数: 0001-3000

ISBN 978-7-102-04365-4

定 价: 196.00 元

王羲之及其书法艺术

雒三桂

王羲之（三〇三—三六一），字逸少，晋代琅邪（今山东临沂）人。

琅邪虽然僻处于山东半岛东南，在魏晋时期却人才辈出，其最著名者就数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和琅邪颜氏。琅邪诸葛氏的代表人物是诸葛亮兄弟；琅邪颜氏的代表人物是颜含，本枝绵延，到六朝末年和隋、唐时期的杰出人物则有颜之推、颜师古和颜真卿。琅邪王氏自西汉晚期以后就成为一个诗书传家的文化世家。东汉时期，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兴起，琅邪王氏也崛起于琅邪，并成为魏晋时期琅邪地区政治和文化世家之首。东汉末年至东晋时期，琅邪王氏高官迭出，影响巨大。王羲之父祖辈一系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祥、王览、王导、王敦等。王祥官至司空、太尉，封睢陵侯，食邑一千六百户。王览官至太中大夫，封即丘子，邑六百户。琅邪王氏的另外一系王戎和王衍家族中，王戎的祖父王雄曾为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浑是王祥的族侄，王雄与王祥则为同族兄弟，而王衍的父亲王义则为王浑的兄弟，官平北将军。王戎官至左仆射，领吏部尚书、司徒；王衍更位居宰辅，左右西晋晚年的政治局势。因此，琅邪王氏在西晋晚期的政治地位除司马氏外几乎无人可比。

公元二九一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司马氏皇室自相残杀，并将国家带入动荡、悲惨的境地。『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司马越取得胜利，控制朝廷，而晋朝江山却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拥护成都王司马颖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和羯人首领石勒的军队专门与司马越作对，横行中原，西晋王朝岌岌可危。司马越为留后路，委任当时势单力孤的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并派王导为之辅佐。惠帝永兴二年底，江东发生陈敏之乱。陈敏之乱被平定后，司马越认为江东地区危机重重，需要派心腹镇抚，遂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守建业（今江苏南京）。司马睿来到建业之后，却面临着许多困难。司马睿本人的地位名望不足以镇服人心，且江东地区孙吴旧族与西晋朝廷和北方士族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司马睿的到来心怀戒备。江东孙吴旧族盘踞江东一百多年，宗族强固，势力强大，如果不能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司马睿便很难在江东立足。在王导等的大力协调之下，江东旧族

逐渐接受了司马睿政权。而王导的另一个堂兄弟王敦富于军事才能，也为司马睿镇守江东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睿又是姨表兄弟关系。晋元帝司马睿是王羲之的姨表叔，晋明帝司马绍是王羲之的姨表兄弟。司马睿要立足江东，必须得到琅邪王氏的大力协助。而王导、王敦兄弟也费尽心力，帮助司马睿在江东地区打开了局面。公元三一八年西晋灭亡之后，在王导、王敦等人的拥戴之下，司马睿在建业即皇帝位，为司马氏政权保住了半壁江山，琅邪王氏居功至伟，司马睿虽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东晋朝廷在东晋初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司马氏和琅邪王氏共主的朝廷，琅邪王氏子弟皆身居要职，遍布朝廷内外，因此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曾官淮南内史、丹阳太守，是建议司马睿过江避难、镇守建业的第一人，也是司马越的死党，只是去世很早。后来王羲之曾在《誓墓文》中称自己『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说明王羲之是在母亲和哥哥王籍之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王籍之曾任建安太守，去世的时候也很年轻。王羲之晚年曾有一封书札谈到迁移哥哥王籍之的灵柩：

四月五日羲之报。建安灵柩至，慈荫幽绝，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彻五内。永酷奈何！无由言告，临纸摧哽。羲之报。

尽管过早地失去了父亲，但出身琅邪王氏家族的王羲之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有着比普通人更多的人仕和发展机会。早年的王羲之内向木讷，不善言辞，成年以后，才变得神采朗彻，风度翩然。从有名的东床快婿故事中我们可以想见王羲之当时的风采。而王羲之的仕途并不顺利。据《晋书·王羲之传》的记载，王羲之『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的其他职务还有会稽王友、临川太守等。而最后的职务则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王羲之的仕宦生涯虽然并不顺利，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判断力。在庾亮幕府期间，虽然庾亮与王导等人矛盾甚深，却对王羲之信任有加，关系甚好。接替庾亮职务的庾翼、庾冰兄弟和王羲之的关系也不错。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大概在庾亮去世到庾翼于晋康帝建元元年请求北伐并兼任江州刺史期间的三年间。之后，王羲之赋闲了一段时间。晋康帝建元二年至三年，半年之内，庾翼兄弟相继去世。在传世的几封书札中，王羲之对庾氏兄弟的去世表现得十分哀伤。如：

庾虽疾笃，谓必得治力。岂图凶问奄至，痛惋情深！半年之中，祸毒至此，寻念相摧，不能已已。况弟情何可任？遮等荼毒

备尽，当何可忍视！言之酸心，奈何奈何！

庾翼兄弟去世后，朝廷任命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控制了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桓温雄才大略，荆楚地区又为东晋上游门户，北邻强胡，西邻成汉，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一旦桓温个人野心膨胀，东晋朝廷便难以控制。所以，在任命桓温的同时，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又征召名士殷浩出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掌控长江下游以和桓温抗衡。桓温知道朝廷的用意，十分不悦，和东晋朝廷因此而处于游离状态，八州士马资调不为朝廷所用。殷浩在当时名声极大，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为当时风流谈论者所宗。三府连辟，皆不就。庾亮、庾翼兄弟多次征召，皆称疾不出，隐居几将十年。当时的清谈之徒将殷浩和管仲、诸葛亮等人相提并论，王濛、谢尚之徒更伺其出处以卜江东兴亡。庾翼去世后，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殷浩，说『足下去就即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才打动了殷浩。殷浩也由此出任扬州刺史，开始其悲剧政治生涯。

桓温担任荆州上流的重任之后，即表现出雄武过人之才和勃勃野心。晋穆帝永和二年冬天，桓温乘成汉政权腐败堕落、危机四伏，从荆州出兵巴蜀，仅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就将割据巴蜀数十年的成汉李氏政权消灭，重新控制长江上游，桓温也因此而威名大震，举朝畏惮。为了和桓温抗衡，会稽王司马昱命殷浩参综朝政，引为心膂。殷浩执政后，征召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王羲之则推辞不答，要求朝廷任命自己为宣城太守，但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最后，司马昱和殷浩任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不得已而接受了这个任命。王羲之从大局出发，认为朝廷、殷浩和桓温之间的矛盾将为东晋朝廷带来巨大不利，因此写信力劝殷浩主动与桓温修好，朝野一心，共御强敌，殷浩却听不进去。

永和三年桓温灭蜀之后，北方的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永和四年夏天，后赵主石虎的儿子石韬因为和太子石宣争宠，被石宣杀死，石虎发现后又将石宣处死，又杀其妻子九人及东宫四率以下三百余人，宦官五十人，并将东宫卫士十几万人滴戍凉州，导致梁犊之乱。梁犊之乱虽然被平定，但立下战功的羌族首领姚弋仲和氏族首领蒲洪的势力开始膨胀。不久石虎死去，石氏兄弟自相残杀，后赵陷入大乱。东晋政府认为有机可乘，遣征北大将军褚裒率军北伐，桓温也率军出屯于安陆（今湖北安陆），摆出进军北方的架势。北方人民纷纷起兵响应，或乘机举族南下。但北伐的晋军作战不利，迅速被后赵军队击败，

数十万北方百姓因此而被后赵军队围攻，死亡殆尽。至永和六年春天，石虎的子孙被全部杀光，冉闵建立冉魏政权，并与姚弋仲、蒲洪等人交战。姚弋仲、蒲洪见中原大乱，都想乘机进占关中以图割据。姚弋仲被蒲洪打败。不久蒲洪被毒死，蒲洪子苻建进占关中，为稳定政权而暂时上表东晋朝廷，接受东晋封号，并派人与桓温修好。姚弋仲进退失据，也遣使向东晋表示归顺，东晋朝廷封姚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又加姚弋仲的儿子姚襄为使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姚氏父子之归顺东晋政权，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非真心。不久姚弋仲死，姚襄代领其众。姚襄少有高名，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声著名于东晋。姚襄归晋之后屯于谯城，单骑渡淮，见谢尚于寿春，二人一见，欢若平生。投奔东晋之初，姚襄还比较尽心尽力，但姚襄和谢尚二人的军事行动非常不顺利。

桓温见北方大乱，认为可以建功立业，上疏朝廷，请求北伐，东晋朝廷却不愿意桓温因北伐而势力更加强大，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又逼迫东晋朝廷不得不遣军北伐。因此，殷浩将北伐的重任担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永和八年，殷浩的北伐行动开始实施。但殷浩缺乏军事才能，不谙用人之术，又不善于处理与姚襄之间的关系，所以屡屡失败。当时因北方大乱，后赵的一些将领为保存实力而暂降东晋，殷浩对他们信任有加。孔岩等人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曾写信力劝殷浩，认为这些降附之徒都是人面兽心，贪而无亲，难以义感，十分危险，殷浩却听不进去，谢尚等人因此失败。殷浩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王羲之给殷浩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殷浩量力而行，不要冒进，并认为以东晋当时的力量无法完成收复北方的任务，殷浩同样也听不进去。王羲之还给执政的司马昱写了一封信，劝司马昱对北伐之事三思而行，并建议还保江、淮一线，司马昱也没有接受王羲之的意见。永和九年，姚襄屯于历阳，见北方方强，无法北归，便在淮河两岸屯田，训厉将士。殷浩见姚襄的实力越来越雄厚，更加忌惮，多次派刺客前去刺杀姚襄，都没有成功。永和九年冬天，殷浩为实现北伐占领洛阳的企图，遣姚襄为前锋，自己随后率军进发。不料姚襄在山桑（今安徽蒙城）设下埋伏，大败殷浩，晋军辎重尽失，丧亡无数。在殷浩率军出发之前，王羲之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对殷浩的北行表示了担忧，却无济于事。

殷浩的失败，在东晋朝廷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桓温上疏历数殷浩的过失，东晋朝廷不得不废殷浩为

庶人，自此朝廷内外大权都被桓温控制。对于殷浩的被废，王羲之也只有叹息而已。

自从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任上，王羲之尽自己之所能，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他深切体会到百姓的痛苦，多次上疏朝廷，要求减轻东南地区百姓沉重的赋役负担。在写给好友谢尚的信中，王羲之曾谈到当时百姓的赋役之重、地方官吏的贪污、朝廷的朝令夕改、服役的兵士和百姓因不堪忍受而叛散的问题。由于不喜欢吏职的繁琐，王羲之对仕途生涯表现出明显的厌烦。在传世的王羲之书札中，有不少是谈论当时政务的，包括赈济饥荒、禁酒令的实施、减轻赋役、户口黄籍问题、百姓逃亡等。还有些书信召集朋友游历山水，他经常邀请的朋友包括谢安、谢尚、谢万、许询、王胡之、孙绰、阮裕等人。

永和十一年三月，王羲之因为长期疾病所困扰，又与当时的扬州刺史王述不和，辞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职务，从此隐居山阴，再不出仕。

王羲之退居的山阴一带，是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后从北方南下的中原士族聚居地区。王羲之为官会稽之时，就在山阴购买田产，安家立业，并将父母和哥哥的坟墓迁到了山阴。永和十一年五月，屯居于淮南的姚襄在部下的劝说下北返，进占许昌。十月，东晋朝廷任谢尚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以为进取之计。到第二年，晋军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桓温甚至上表朝廷，请求移都洛阳，修复园陵。表章上了十几次，也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因为当时的东晋朝廷根本不敢冒这个险。但因为姚襄盘踞许昌，东晋朝廷又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以讨伐姚襄。七月，桓温率军从江陵出发，开始北伐，并于八月在洛阳击败姚襄，收复故都洛阳。这次胜利在东晋朝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这是东晋政权在南迁之后的一次最大胜利。它不仅扫除了殷浩失败的耻辱，而且在西晋王室倾覆之后第一次将晋军的旗帜插上了洛阳城头。王羲之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对前方的战事却十分关心，并对桓温的军事才能表示由衷的赞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王羲之一再说『桓公威勋，当求之古，令人叹息。』又说因为桓温的胜利，而『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这就是著名的《破羌帖》、《桓公帖》和《虞义兴帖》。

升平二年（三五八）秋，豫州刺史谢奕去世，会稽王司马昱任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谢万工言论，善属文，谈吐不凡，却没有实际才能。王羲之十分了解这个好友的特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亲自给谢万写了一封书信，劝他『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这样才能担当好如此重任。谢万却在受任之后『矜豪傲物，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哥哥谢安非常担忧，跑到谢万军营中去为谢万分忧，『自队主将帅以下，安无不慰勉。』纵然这样也无济于事。不久，谢万率众增援洛阳，刚刚进入淮河一带，遇上北中郎将、王羲之的妻弟郗昙因病从前线退还彭城（今江苏徐州），谢万以为郗昙是因为北方敌人势力太强而后退，大为恐慌，引军撤退，导致军心离散，全军溃败，谢万单骑渡过淮河，狼狈而归，被废为庶人。后来，谢万曾给王羲之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辜负了朋友的期望，表示惭愧不已。谢万被废后，因为谢家在朝中已经没有任何任职者，为了谢家的利益，谢安不得不出仕。

总的来看，王羲之辞官之后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从这个时候起，他才可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

王羲之最关注的，是修道服食。服食是道家的养生方法，指服食丹药以求长生。服食之风起于汉代，而炼药以求长生，先秦时期的齐、燕方士已经开始了。到秦汉时期，这种风气更加盛行。魏晋时期，名士们服食便蔚然成风。尤其在东方滨海地区，这一地区天师道十分盛行，参与服食养生的人也更多。琅邪王氏世奉天师道，自然在于此列。《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王羲之辞官之后所交往的人物，大部分都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许迈。

由于琅邪王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所以五斗米道所讲求的清修也成了王羲之的必修课。在著名的《十七帖》及其它传世诗文中，王羲之便多次谈到自己的服散养生生活。在一封写给老友周抚的信札中，王羲之说：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实际上，服用寒食散并没有给王羲之带来他所期望的健康，反而使他的身体陷入长期难以治愈的痛苦病态。王羲之经常在给朋友的书札中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常常是病况。在王羲之的书札中，便经常提到自己服用寒食散后的『中冷』症状。中毒的结果，便是身体要承受长期的慢性病痛折磨。另外，晋代的门阀士族早已习惯于养尊处优，平时出行或乘坐牛车，或乘坐肩舆，或凭人而行，很少走路。服用寒食散之后，更加不愿意走路，也更容易陷入这个怪圈之中。王羲之也是这样。王羲之晚年时由于长期

服长期服用寒食散，身体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很少走路，甚至十几年脚不践地。由于王羲之的朋友中服用寒食散的人较多，所以在王羲之的书札中经常能够见到王羲之和朋友们讨论服用寒食散或关于对方身体状况的内容。服用寒食散之后所常见的中毒现象，就是腹泻。持续不断的腹泻在王羲之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不仅王羲之自己服食，家人也像他一样服食。关于晚年身体的衰朽，王羲之常常表现在书札之中，这种衰朽的感觉又常常伴随着对友人的思念。

辞官而退居山阴之后的王羲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与平和。那些已经辞官或退隐的老友们还经常书信来往。谢万废官之后，也居住在会稽郡中，与王羲之相距不远，两人还经常书信往来。王羲之在给谢万的书信中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满足：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生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遇重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世。君察此，当有二言不？真所谓贤者志于大，不肖志其小。无缘见君，故悉心而言，以当一面。

王羲之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全身而退，避开激烈动荡政治漩涡，实在是一件幸事。在自己新置的庄园之中，修植桑果，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时时与亲知共欢宴，欣然自得，忘怀世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他所期望于子孙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向汉朝的万石君石奋一家那样以忠厚传家。陆贾、班嗣和杨王孙这些前代通达的圣贤也是自己向慕已久的。

王羲之在给谢万的这封书札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是和他《兰亭集序》中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另一封书札中，王羲之说：

仆近修小园子，殊佳。致果杂药，深可致怀也。恍因行往，希见比二处动静。故故常患。驰情。散骑病转利，庆慰。姊故诸乃反侧。永嘉至奉集，欣喜无喻。余可耳。

从这封书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羲之归居田园的乐趣。

在写给老朋友的书信之中，王羲之也常常规劝别人像自己这样生活。著名的《十七帖》中有一封信札，云：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

八

王羲之辞官之后的另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是山水之游。

王羲之以及东晋时期其他北方南迁士族所以在会稽一带买田置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会稽一带自然山水的清秀美丽，冠绝天下。《晋书·王羲之传》：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最早认识会稽山水之美的便是东晋士族。《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许多东晋士族欣赏会稽美丽山川的精彩话语：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蒸霞蔚。』

道一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一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心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像东晋名士这样在纯自然的优美环境中体悟到山水之美，并用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当王羲之还在会稽任职的时候，便常常想游览山水，但官场俗务使他不能脱身。在王羲之的传世书札中，有一些文字涉及到了当年王羲之与谢安等人在会稽一带游历山水的生活。除了享受登山临水之乐，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采药。

退居山林的生活并不总是顺心的。而孙子辈的病痛和夭亡更令年纪向衰的王羲之痛心。王羲之的晚年书札中几次提到王献之的女儿官奴的生病和夭亡，如著名的《官奴帖》：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痢，至今转笃。又苦头痛。头痛已溃，尚未足忧，痢病少有差者。忧之焦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戒，以至于此。民惟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已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

这是玉润病重期间所写。王羲之深爱着自己的孙女。对玉润的病情，王羲之忧心忡忡，甚至觉得自己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戒而至于此。王羲之所谓的『勤修』和『科戒』，当是指他所信奉的五斗

米道的有关科戒和条规，而不是指朝廷的有关法律。这封书信可能是写给当时执政的简文帝司马昱的，因为王羲之在书札中自称为『民』，而简文帝和王羲之一样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王羲之还有两封书札谈到玉润的夭亡：

延期。官奴小女疾病不救，痛愍贯心。吾以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天命。惋伤之甚，未能喻心。可复如何！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

其他亲人的去世也令王羲之伤心。如：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媿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

这幅著名的《姨母帖》现藏辽宁博物院。有学者认为王羲之的姨母是著名的卫夫人，或许是事实。又《豹奴帖》：

羲之顿首。昨得书问，所疾尚缓缓，既不能眠食，深忧虑，悬吾情，至不能不委。嫂故不差。豹奴晚不归家，随彼弟向州也。前书云，至三月之间到之，何能尽情忧？足下所惠，极为慰也。不谓也。

文中所谓『豹奴』不知谓谁。但应当是王羲之的家人。这段文字是王羲之传世书法之中的一幅草书。因未著年月，所以不知道书于何时。

王羲之的晚年生活既安静又痛苦。安静是因为辞官之后没有了俗务的缠身，可以自由自在，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痛苦却是王羲之自己找的。服食修炼本来是为了益寿延年，最后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痛苦，这是王羲之所不曾想到的。王羲之去世于升平五年，具体的时间我们无法搞清楚，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情节。而一代文化巨人的最终归宿是会稽的山野乡间，却也令人无限惆怅。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名士中间流行清淡。王羲之虽然是当时的名士，但并不善于清淡。至少从今天我们能够掌握的材料来看，王羲之在这方面并没有过人之处。在当时，人们对王羲之更为看重的是他的与清淡和修养相联系的风度才情。

最早对王羲之品评的人是王羲之的族叔王敦。《世说新语·赏誉》：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

王羲之在当时的名士之中，也被名士们品评定目。王羲之的风度，也令当时人钦服。《世说新语·容止》：

时人目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对王羲之风度才情的肯定，无疑是基于王羲之本人所表现出来的特异的气质之美。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真切地感知王羲之的风度，却可以从他传世的书札之中，感受到他的潇洒飘逸，他的倜傥不羁，他的『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尤其是像《十七帖》、《频有哀祸帖》等这样比较接近于王羲之原迹的名帖。最能代表王羲之参与当时名士清谈和王羲之风度才情的是王羲之在永和九年兰亭雅集上所作的《兰亭集序》和《兰亭修楔诗》。

永和九年的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朋友们举行了一次被楔活动，其地点选择在兰亭。这里离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的会稽郡治不远。在这次被楔集会上，王羲之创作了他千古不朽的名篇《兰亭集序》，又叫《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在当时只是一次一般意义上的文人雅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次雅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越来越重要，因为它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东西，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兰亭雅集的参与者大都是中国文化史、艺术史、宗教史和政治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宋人桑植之在《兰亭考》一文中曾引用他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对当年的兰亭盛事详加考证。当时参与兰亭雅集的除了王羲之外，还有著名政治家谢安，谢安的弟弟谢万，著名文学家孙绰、孙统，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涣之，郗昙，袁峤之，庾蕴以及许询、支遁等。这些人物在晋代历史和中国文化、宗教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其次，兰亭雅集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兰亭集序》。它是中国古代最优美的散文之一，长期为后人所传诵。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手写的《兰亭序》墨迹是中国书法艺术千古不更的极则和楷模。

魏晋时期，中国书法艺术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盛行于汉代的隶书自桓、灵之后逐渐趋向僵化、呆板。这一时期的碑刻，尤其是那些丰碑巨制的书写过于强调波磔的装饰性，点画越来越趋于整齐划一，原先那种生气勃勃的气韵风格逐渐消失，而呆板僵化之中也孕育着新的变革。

魏晋时期的隶书虽然衰落了，但从隶书的草写之中孕育出的章草却逐渐走向高潮。早在西汉晚期，

章草便初具规模。章草『存隶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联机就』（张怀瓘《书断》）的特点使它成为汉代士人书札通问、簿籍记载最常用的书体。东汉晚期，章草在士人知识分子中的流行甚至引起了名士赵壹的反感，写下了著名的《非草书》。到汉末魏晋时期，章草书法的字体结构逐渐规范化，其点画充分熔铸了隶书的波磔之美，不仅书写简便，而且抑扬顿挫，富于节奏感和形态美，气韵典雅古朴，流动活泼。所以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赞章草书法『婉若回鸾，攫如搏兽，迟迴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学者为宜。』

张怀瓘明确指出当时的章草书主要运用于尺牍之中。而正是这种运用，为章草向今草转变埋下了契机。历代辗转摹刻的章草书法遗迹如吴皇象的《急就章》，西晋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章草定型之后的基本面目，而陆机的《平复帖》以及近代以来西北地区所出土的汉晋简牍和残纸，则使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一时期章草书法在当时流行的真面目，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当时的章草书写情况，还使我们知道，一种标准书体的出现，必然要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进步。这些章草墨迹，实际上是魏晋士族标准章草书法的源头。

一种标准书体的出现，其初创者往往是民间的无名书家，而其定型和通用，则有待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士族阶层艺术家的认可和使用。魏晋时期章草艺术的定型，主要因为钟繇、皇象、索靖、卫瓘、梁鹄、陆机、张芝等士族艺术家们的巨大影响。而章草向今草转变并获得全社会的通用，也同样因为东晋时期的士族艺术家如王羲之、王献之、谢安等人的巨大影响。

魏晋时期中国书法的另一个巨大发展是楷书的出现和流行。

楷书是从隶书发展而来，这是一般人的意见。而裘锡圭先生却认为楷书来源于行书。从书法的发展脉络和书写习惯的改进来看，裘锡圭先生的意见有相当的道理。虽然传世的钟繇诸帖令人怀疑，但到东晋时期，王羲之等书法家将楷书艺术真正定型。楷书通行之后，书写速度比隶书提高了许多，从而取代隶书而成为全社会最通行的书体。为楷书的发展树立榜样，并最终成为最高典范的同样也是王羲之、王献之等东晋士族书家。

行书的发展与楷书的演进并行不悖。

从今天的史料来看，行书的出现要早于楷书。早在汉代，为提高书写速度而创制的简写行书便已经

流行于世。而提高书写速度的方法就是将隶书中的波磔和挑法去掉，一笔带过，不做任何修饰。由于草书（章草）也在同时发展，两者之间常常相互影响，草书的许多写法被运用于行书之中，一种介于楷、草之间的新书体因此出现。当时行书主要运用于书札来往之中，尤其为人们所珍视，刘宋时期的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所说的钟繇所擅长的『行押署』便是指的行书。而且，行押书恰恰是汉魏晋时期士族书法所通行的主要书体。王羲之父子正是在这种书体上登峰造极。今天，虽然汉代的行书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我们却有幸能够看到魏晋之际的行书。楼兰地区出土的《白昼济逞残纸》，其书写者便是将隶书的点画简单化、直接化，随意而出，虽不规范，却具雏形。《九月十一日等字残纸》、《小人董奔等字残纸》、《白敦煌等字残纸》、《虽不等字残纸》的行书笔法已经非常流畅。特别是《小人董奔等字残纸》的书法，笔法跳跃，意似断而实连，笔力细劲跳荡，今日对之，尤觉其风采过人。将《虽不等字残纸》放大细看，竟然已经具有了二王的风度神韵，其雅致轻快，后之学书者多不可及。而《正月廿四日等字残纸》，也足以让后人顶礼膜拜。

到东晋时期，由于士族书法艺术家们的广泛参与，行书、草书和楷书艺术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是划时代的，其流风所及，对以后一千多年中国书法的影响非常深远。而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主要发生在以王羲之、王献之、谢安、王珣等人为代表的东晋南朝士族书家身上。这种现象不是一种突然发生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书法艺术在士族文人之中流行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是今草、行书抑或是楷书，都由于东晋南朝士族艺术家们的参与和创造而出现了质的飞跃。两晋之际，随着隶书点画的嬗变，隶书逐渐楷书化，特别是在士族书法家中，这种嬗变最先成熟。而楷书的成熟，又为新行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王羲之父子所创造的俊逸、流美、雄健的新行书又是士族书法的代表。

士族书风的流行，可以上溯到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受到人们推崇欢迎的名家。光武帝刘秀爱好书法，汉明帝、汉章帝和后来昏庸的汉灵帝都是书法艺术爱好者。章帝不仅本人爱好书法，还下诏特使杜度以草书上事（见张怀瓘《书断·章草》）。灵帝时因为爱好书法，下诏凡有书画奇能者皆召至京师鸿都门学，并且将是否善书与仕途相联系。《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当时『本颇以经学相召，后诸为尺牍及工鸟篆者皆加招引，遂至数十人。草书的魅力，使汉末的文人知识分子为之痴迷，为之劳心费神，耽搁时日。所以赵壹在《非草书》中抨击当时的士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

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剡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他认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不可强为。且书法『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完全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书法艺术，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草书的流行、行书的初创和楷书的萌芽发展，都给汉代占正统地位的隶书以极大的冲击，并使其笔法不断简化，结体和神韵形态却不断复杂化，以演变出全新面貌的草书、楷书和行书。丛文俊先生曾经指出，这三种书体的最后演进完成，都与尺牍书法的发展紧密相关，也都与以书家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的积极投入紧密相关。换句话说，东汉魏晋是士大夫书家创立新体、领导书法潮流的时代。东汉魏晋时期的士族世家由于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往往名家辈出，世代相承。所以，这一时期的士族世家往往同时也是书法艺术世家。最典型的当然是河东卫氏（卫觊、卫瓘、卫恒等）、弘农张氏（张芝兄弟等）、安平崔氏（崔瑗、崔寔父子等）、颍川钟氏（钟繇、钟会父子等）等。琅邪王氏只是后来居上。

士族世家文人学士在练习、运用书法艺术的时候，真正地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实用结合到了一起。他们径取日常实用书体来表达其人格魅力，使书法成为与其社会地位和审美价值取向大体相当的上品清玩，奠定了书法之所以成为高雅艺术的文化基础。这也是时代变了，书体结构也变了，而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书法仍然以尺牍书法为主的直接原因。

正是这些精美流便的短札，为中国书法艺术开辟了行草书法艺术的一个全新天地。在这种书札中，士族书法艺术家们或致问候，或通消息，或写相思之情，或论服食之道，或谈及时事，或言及亲友，或欢乐，或怅恨，尽情地抒发着自己的心灵。一千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精美的书札，其风流文采，仍然如在目前。而对晋代新行书和今草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仍然是王羲之父子。他们的书法点画技巧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用笔如行云流水，自然合度，典雅精美。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并逐渐从士族书家向社会普及，从江南影响到北方的黄河流域，逐渐成为书法艺术的正宗。北方书家对南朝士族书法艺术极力学习与效仿，到北朝晚期的北齐、北周时期和隋代，北方书家才真正将江南士族所推崇、沿用的书风逐渐融合、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使北方的书法雄峻与蕴藉并存，豪放与典雅兼具，并开启了唐代

书法的伟大与灿烂。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尊崇，与南北朝时期北方胡族政权对被视作华夏文化正宗所在的南方士族文化的学习与崇拜一脉相承。士族书法艺术最终在唐代取得了正式的统治地位。

今楷的出现和普及，还与当时南北方宗教的发展，抄经之风盛行有极大的关系。由于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所以当时的文化典籍不论是儒家经典还是佛教经典，或是个人的著作以及族谱、家谱等，都要靠人工抄写。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信徒所抄经典主要是佛典；而在南方，则既有佛典，也有道教经典。在王羲之传世的作品之中，便有所谓的《黄庭经》，它是典型的道教经典。因为宗教，特别是道教在东晋南北朝的南北方士族之中十分流行，而抄经现象又十分盛行，所以给人留下道教世家便是书法世家的印象。今天所传世的传为王羲之所书的名文，如《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虽然不一定真的是王羲之所书，但其中肯定有王羲之的影子，或是当年王羲之的确曾经抄写过这些典籍。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的书法艺术能在江南地区结出如此丰硕的果实，而在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黄河流域反而没有能够产生出如此伟大的书法艺术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北方江山和水土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的气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艺术上，还表现在学术上。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差别，是和中国南北方巨大的自然环境差异分不开的，而自然山水对人的气质和审美意识的影响是潜在的、巨大的。气质和审美心理的改变必然对艺术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东晋名士对江南自然山水之美的深刻体会以及江南山水之美对东晋名士们心理气质和人生理想、态度的强烈影响是东晋时期中国艺术及其哲学体系建立和完善的主要因素。

会稽、永嘉一带，汇聚着中国最秀丽的山川。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中国风景最美、最多姿的地区之一。在一千多年前的晋代，由于人口的极度稀少，原始状态的江南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修撰于东晋至宋代的地方志书对这一带山水景色的美丽的记载和夸耀延续了近千年，连从未到过江南的郦道元，在修撰《水经注》时，也从他所能搜集到的关于东南山水的记载中加以摘录并将其写入《水经注》中。东晋时期会稽和永嘉郡所管辖的地区，即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始宁、剡、永兴、诸暨一带，今天仍然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著名的天柱山、秦望山等逶迤相连，山下浙水、剡溪等蜿蜒流淌，两岸峰峦叠翠，烟云缭绕，碧水清潭，时相映发，明秀之中蕴含着无穷的灵气，引人遐思，令人陶醉。生活这样的美景之中，怎不令人流连忘返？怎不令人忘掉一切暂时的烦恼而乐于享受身处自然的快乐？无数次地领略江南的莺